清代台湾民间的守护神信仰和分类械斗

颜章炮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emigrants to Taiwan from Fujian and Guangdong lived separately in their own communities and separately worshipped the gods of their ancestral homes as their guardians. Prior to the Guangxu reign, armed feuds often occurred between emigrant groups from different ancestral homes. Historically this fighting was known as sub-ethnic feuding. Guardian gods became the spiritual mainstays and temples became the centers of self-defense in these feuds. Some temples were even used as fortress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se violent feuds, belief in local gods flourished among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the number of temples increased.

明末清初以来，特别是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统一台湾之后，闽粤两省的百姓纷纷移居台湾。随着两省百姓的入台，闽粤民间的神祇也传入台湾。移民入台后，一般以乡籍而类聚，同籍人聚居在一起，形成一种以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群体。这种地缘群体一般都奉祀祖籍地的乡土神为守护神。当时信仰的大致情况是：泉州府移民奉广泽尊王，漳州府移民奉开漳圣王，汀州府移民奉定光佛，广东移民奉三山国王。因泉州府移民最多，其守护神信仰也最复杂，各县移民又有各自的守护神，安溪县移民奉清水祖师，永春、德化的移民奉法主公，同安县移民奉保生大帝，惠安县移民奉青山王。在清代台湾移民社会中，乡土神信仰的认同标志着祖籍地的认同。移民除了奉祖籍地的乡土神之外，也有尊奉中国民间普遍崇拜的神祇作为自己的守护神。这类神祇以妈祖为最常见，此外，关圣帝君、福德正神、神农大帝、城隍爷等都分别被某些移民奉为守护神。泉州府晋江县移民还将该县安海镇龙山寺观音菩萨的香火传入台湾，所建寺院同样名为龙山寺。全台有龙山寺多座，是泉属晋江、南安、惠安三县移民的精神堡垒①。这种守护神信仰对于移民横渡台湾海峡，以及在开发建设台湾的过程中与大自然和社会进行抗争时，起了心理上的慰藉和平衡作用。本文将集中论述守护神信仰和移民分类械斗的关系。

守护神——分类械斗者的精神支柱

漳、泉之民素以“轻生喜斗，善聚党”②而著称，故民间经常发生械斗。其械斗一般是在不同族姓或不同房派之间进行，称作宗族械斗。这种械斗之风随着漳、泉百姓的迁徙而传入台湾。在这方面、粤籍移民并不比漳泉人逊色，曾在台湾“参幕戎伍”的蓝鼎元说：“客庄（粤籍移民聚居的村落——笔者）居民，朋比为党，睚眦小故，辄哔然起争，或殴杀人，匿灭其尸”③。由于漳、泉、粤三籍移民均有“喜斗”之习，遂使械斗之风在台湾肆为蔓延，

与内陆的械斗不同的是，台湾的械斗不是在宗族或房派之间进行，而是在不同乡籍的移民间发生。这是因为闽粤的乡村，一般都是以血缘关系构成，百姓聚族而居，一个村落通常只有一姓，这是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统一的村落。在这种社会群体中，当宗族、房派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爆发宗族之间的械斗。甚至个人的摩擦冲突也演变成房派、宗族之间的流血斗争。移居台湾的百姓则不同，他们“不以族分”，一般依乡籍而类聚，“漳人党漳，泉人党泉，粤人党粤”④。当不同乡籍的移民的经济、政治利益发生冲突，或因习俗、信仰差异而产生矛盾时，每每引发械斗，这时同县、同府、甚至同省的移民都不同程度地卷了进去，发展成不同祖籍移民之间的械斗，史称分类械斗。曾在台湾任官的周凯说：“其村落，闽曰闽社，粤曰粤庄。闽呼粤人为客，分气类积不相能，动辄聚众持械斗。平居亦有闽粤错处者，斗则各依其类。闽粤斗则泉漳合，泉漳斗则粤即伺胜败以乘其后”⑤。同治年间任福建巡抚的卞宝第对分类械斗也有类似的记载：“全台之民，不外粤之潮、嘉，闽之漳、泉。粤与漳、泉又名为三籍，各分气类。从前历有仇杀，积衅已深，每有睚眦小怨，匪徒即交构其间，先则布散谣言，各庄闻而迁徙，一经移动，匪徒遂从而肆掠，因之格斗毙命，势不可解。由近而远，瞬息之间，可延及数十百里”⑥。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末年到光绪初年，台湾发生规模较大的分类械斗近 40 起⑦，其中有福建移民对广东移民的闽粤械斗，有漳州移民对泉州移民的漳泉械斗，还有泉属内部的晋江、南安、惠安三县移民（称作“顶部”，又称“三邑人”）对同安县移民（称作“下郊”）的顶下郊拼。

闽粤民间发生宗族械斗时，都是以血缘关系作为团结族人的纽带，以祖宗的“灵魂”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当大斗发生之时，“则必集众家庙”，祭拜祖先，祈求祖宗之灵庇佑。台湾的分类械斗则不然，各籍移民的守护神是他们参加械斗的精神支柱，台湾民间流传着许多这方面的故事。根据有关史籍的记载，神祇的精神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械斗者参战之前，祈求守护神保佑，或根据神灵指示出战。略举数例如下：

桃园县观音乡草漯保障宫，主神妈祖。道光年间，漳州移民与粤籍移民械斗时，漳州人祈神指示，毫无差误，因得胜利。

桃园县大园乡五权村五福宫，主神开漳圣王。咸丰年间，漳粤人分类械斗时，漳人集体求神保佑，凡依神示，皆得破敌，人民得安且富。

苗栗县后龙镇慈云宫，主神妈祖。咸丰四年闽粤分类械斗时，妈祖藉童乩指示防御方法，令闽人及早关闭城门，使得粤人不能进入⑧。

咸丰九年秋八月，台北发生顶下郊拼，顶郊人在向下郊人发动总攻之前，其头人集中于龙山寺，在其守护神观音菩萨神像之前，“当场请乩童卜定越日午时发动攻势”⑨。

第二，在械斗中，有的移民甚至以神祇为开路先锋，以增强参斗者的信心和勇气。如咸丰九年台北顶下郊拼时，顶郊人“鸣锣击鼓，以王公三爷等神像为开路先锋”，向下郊人发动进攻⑩。

第三，民间制造了许多神灵显圣助战的神话故事，这同样是为了增强参斗者的信心，提高他们的斗志，以期在械斗中取胜。兹再举数例如下：

台北县三峡镇福安宫，主神福德正神。嘉庆年间，泉、漳人分类械斗，神助泉人，于双方阵中凭童乩宣示：本神当出阵。次日果见漳人阵中忽现二十一斗士，纵横翻旗驱敌，致泉人战胜。

基隆市玉里里奠济宫，主神开漳圣王。咸丰年间漳泉分类械斗时，开漳圣王派遣神兵助

战，保护漳人，陷泉人于海杀之。

台中县神冈乡李仙祖庙，主神李仙祖。神冈乡为福建移民聚居之地。咸丰三年闽粤人因故械斗，粤人数千进攻神冈乡。当时乡人为数甚少，以为众寡不敌。当此危急之际，忽有树白旗红旗者众多来援，粤人见之畏惧，遂即退却。事后始知仙祖显灵[11]。

咸丰九年台北顶下郊拚后期，顶郊人在战斗中采取火攻，但此时东北风正盛，火焰反而吹向顶郊人。顶郊人大惊失色，面面相觑，“忽见云端出现一位白衣女人，向火扬袖，朝西北方煽去”，致使下郊人大败而逃[12]。这位白衣女人就是顶郊人的守护神——龙山寺观音菩萨。

从上面所举的事例可见，各籍移民都编造其守护神指示灵验或显圣参战的神话，它反映了一种地缘群体的社会文化现象：台湾的移民社会不是以血缘关系构成，而主要是以地缘关系构成，所以在分类械斗中不可能象内地的宗族械斗那样，以一姓一族的祖宗“灵魂”为旗帜进行号召。械斗的各方只能以各自的守护神为旗帜，藉着大家对守护神信仰的认同，亦即对地缘关系的认同来加强同籍人内部的团结，并以守护神的“庇佑”来提高械斗者参战的勇气。

寺庙——分类械斗者的自卫中心

会馆是中国移民社会的产物，是同籍人联谊、互助的主要场所。清代台湾各籍移民的守护神庙宇往往兼为同籍人的会馆，如台南市北区立人街的三山国王庙，又称潮汕会馆[13]。该市中区的银同祖庙，“实则银同（即同安——笔者注）会馆”，庙中供奉妈祖、保生大帝等神像，“凡同人之来郡者，寓焉；及试期，士子寓者尤夥”[14]。彰化的银同会馆设于永乐街庆安宫，俗称大道公庙，主祀保生大帝，系嘉庆二十二年同安移民鸠金公建[15]。同安移民以保生大帝为守护神，所以其会馆皆以保生大帝庙宇为之。汀州会馆则设于汀州府移民的守护神定光佛的寺庙，如台北县淡水镇的鄞山寺（主祀定光佛）和彰化市光复路的定光佛庙，均为汀州会馆[16]。金门移民以苏府王爷（又称苏府千岁）为守护神。该神原祀于浯洲屿（今金门岛金湖镇），为金门乡土神，移民入台时，将其香火传入台湾。台湾的三个主祀苏府王爷的庙宇分别在台南市安平区、彰化县鹿港镇和台北市艋舺，也都兼为金门会馆[17]。台北的顶郊会所即在顶郊人守护神观音菩萨寺院——龙山寺[18]。从寺庙兼作同籍人会馆这一点，说明寺庙成为同籍移民联络的纽带。许多资料反映了移民在寺庙聚会联谊，订立并发布乡规民约，调解内部的矛盾纠纷，寺庙发挥了移民自治中心的作用。

这些作为移民自治中心的寺庙，一旦分类械斗爆发，则又成为械斗者的自卫中心。以台北地区为例，阳明山区士林镇的芝山岩开漳圣王庙、台北县内湖乡的碧山岩开漳圣王庙和台北县新店镇的大平顶开漳圣王庙等，都是当时漳州府移民的据点，械斗时是漳属移民的策划和指挥中心。台北市艋舺清水岩祖师庙，则为安溪移民的根据地。同在艋舺的龙山寺，俨然为泉州三邑人的大本营，无论是漳泉械斗或顶下郊拚，该寺都发挥重要作用。咸丰年间顶下郊械斗激烈，持续多年，至咸丰九年八月，顶郊人准备发起进攻，“首领黄龙安立即召集全部头人到龙山寺商量，席上决定先发制人，并定一计克服敌人”。次日，顶郊人按照龙山寺会议的计谋部署进攻，终于大败下郊人[19]。由此可见，寺庙成为械斗首领运筹决策的中心。

台湾寺庙现存的一些碑刻也反映了寺庙在分类械斗中所处的中心地位。例如屏东县竹田

乡西势村一带是粤籍移民聚居的地方，其庄众自行组成先锋、左、右、中、前、后六堆，每堆设总理，六堆共设总理、副理。同治八年，六堆总、副理与八老爷庄耆老在村中忠义庙立约树碑，碑约的内容是“恭入义民，永结同心。倘日后贼匪扰乱，亦不得反悔，藉端致扰滋事”[20]。同治十二年，六堆总、副理复与各堆总理立约：“永归义民，倘有地方扰攘，依照粤籍旧规题派，不得另行私索”[21]。在同年立的另一方石碑上写着：“倘有地方扰乱，设堆防堵”[22]。石碑的内容表面上是反映粤籍移民在扰乱的年代加强团结，愿为“义民”。所谓“义民”，是指那些在农民起义爆发之时，站在清朝官府一边，帮助官军镇压起义的人。粤人所以乐意当官府的“义民”，目的是借官府的力量打击闽籍移民。因为台湾的粤籍移民不像泉州、漳州人那么多，在闽粤分类械斗中，粤人往往吃亏，他们就寻找机会进行报复。民间的暴动和农民起义便为其提供了机会。清代台湾历次的民间暴动和农民起义，其领导者都是福建人，参加者也大多数是漳、泉人。当规模较大的起义爆发之初，因声势浩大，粤人不敢撄其锋，有些甚至还附和起义的民众。而当大批官军前去镇压之时，粤人便站在官府一边，自称“义民”，追随官军镇压起义民众，其实质是借官军之力打击闽籍移民，以泄械斗中吃亏之愤。朱一贵起义时，粤人采取这种策略，“后此林爽文、张丙之乱，先后一辙，为功首不为罪魁。闽人常憾之，而无如何”[23]。由此可见，碑刻上“恭入义民，永结同心”、“设堆防堵”的记载，说的是粤籍移民共同立约，加强团结以对抗闽人的事实。移民首领在寺庙立约，并将约碑竖于寺庙，反映了寺庙在械斗中所处的地位。

不仅是上述那些民间号召团结、共抗外籍移民的规约刻碑立于寺庙，连官府劝谕停止械斗的布告也刻碑立于庙里。在苗栗县后龙镇中港慈裕宫后庭，立有两方“劝中垅漳泉和睦碑”。立碑的背景是：道光年间，中港后龙分类械斗激烈，死伤甚众。道光二十四年，彰化一带械斗又起，淡水厅同知曹谨恐械斗蔓延到后龙，遂出布告劝谕各方和睦相处。布告说，移民不论是来自广东或来自漳州、泉州，既“同在一国，则亲于一国，同在一乡，则亲于一乡，无分亲疏，无分疆界……愿自今以后，尔无我诈，我无尔虞，不唯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共敦古处之风，行将睦姻任恤，耦俱无猜，同享升平之乐”。布告刻碑立于慈裕宫中，“以垂永久”[24]。另一方石碑的立碑时间不明，内容与前碑相仿，是淡水分府劝谕漳泉移民息斗和睦的布告[25]。官府把这些布告刻碑立于寺庙，说明官府也认可了寺庙在分类械斗中的中心地位。

寺庙的自卫中心地位还体现在其设施上。不少寺庙具备军事防御设施，在械斗中成为一方的堡垒，以抗拒对方的进攻。台北阳明山区士林镇的芝山岩，到现在它的外围还保留着城墙和一座隘门。城墙以石材建造，隘门原有东、西、南、北计四座，现仅余一座[26]。台湾的隘门系以泥土或砖石砌成，有单门和双门之分，有的还设有顶楼，可供了望。隘门一般建在街衢或村落的入口处，白天和平时开启，夜间和战时关闭，因而具有防盗、保障内部和抗拒外部进攻的功能。当不同村落、街道的居民发生冲突、打斗之时，弱者只要躲进本方的隘门，强者一般就会停止追击，因而在清代台湾民间流传着“恶不过隘门”之说[27]。芝山岩、碧山岩和大平顶开漳圣王庙这些漳州移民的据点都是建筑在山顶之上，其出发点也是从便于防御考虑。因为当年台北地区的移民中，泉州人占大多数，漳州人处于少数地位，漳、泉二府移民不时发生冲突和械斗，漳州人时时担心其防卫中心会遭泉州人袭击，便将庙宇建于山顶之上，以便防守[28]。在大平顶开漳圣王庙的墙上还设有许多炮眼，这些炮眼至今仍作为史迹而被保留着[29]。

寺庙在分类械斗中既然成为各方的自卫中心和堡垒，它必然也就成为敌方攻击的目标。咸丰三年，台北发生漳泉械斗，移民传说，在战斗中新店大平顶太平宫的开漳圣王常在漳人阵头挥长剑以应战，泉人恨之，火烧太平宫，夺去圣王神像，削抉神之眼鼻，且抹以污秽㉚。这次械斗还烧毁台北县新庄的武圣庙㉛。至咸丰九年，台北的漳泉二府移民再起械斗，漳州人密议偷袭泉州人的保生大帝庙宇保安宫，因故未能得手㉜。咸丰年间的顶下郊拼后期，台北之三邑人向同安人发起猛攻，攻入同安移民集居的八甲庄，放火焚烧同安人的守护神庙宇城隍庙㉝。台中县大雅乡秀山村的长发宫，在道光年间的分类械斗中被漳州人烧毁。桃园县大溪镇南兴里的永昌宫，主祀神农大帝，为乾隆年间粤籍人所建。道光五年闽粤分类械斗时，粤人以此庙为中心抗击闽人，闽人不利，请淡水海防分府将庙烧毁㉞。前面述及的中港慈裕宫，在道光六年的分类械斗中被焚毁，至道光十八年才又重建㉟。寺庙遭受械斗者攻击的事实，反证了它在械斗中的重要地位。

分类械斗促进神灵信仰的发展

由于守护神及其庙宇在分类械斗中有着精神上和军事上的意义，所以在分类械斗激烈的年代，台湾民间的神灵信仰也进一步发展。

械斗者事先祈神保佑，如果他们在械斗中取得胜利，则认为自己取胜是由于神祇的庇护。为了报答神明庇佑之功，事后便扩建重修庙宇，或为本来祀于私家的神祇雕像建庙。前面述及的在械斗中“显灵”的桃园县观音乡草漯保障宫的妈祖和大园乡五权村五福宫的开漳圣王，原本皆祀于私人家中。漳人认为妈祖和开漳圣王在械斗中显灵庇护，漳人方能取胜，事后便分别创建宫庙，将神像奉请入庙，加以崇祀。同在大园乡的埔心福隆宫，也是因分类械斗创建的。道光年间，漳州移民与广东移民分类械斗，埔心之漳州人认为祈神可得平安，于是纷纷祈祷祀于漳州人游红春家的开漳圣王，“灵应显著”。埔心漳人便创建福隆宫，由景福宫分香，供奉开漳圣王。嘉义县水上乡的英济夫人庙，其创建也源于分类械斗。“此为咸丰三年，泉漳人分类械斗时，张氏姑婆祖化为小女骑马，与泉人大战，遂把敌人击退于湖仔内庄，水上庄因而得平静。嗣后乡人感其德，塑骑马像，建庙祀之”。那些本来就有庙宇的神祇，也因在械斗中“显灵”，香火更加旺盛。如苗栗县后龙镇慈云宫的妈祖，民众传说她显灵以退粤人的进攻之后，祭祀酬恩之人象潮水般地涌向慈云宫。台中县神冈乡的仙祖庙，也因仙祖“显圣”惊退粤人，使乡里获安，“因此祭祀益兴”㊱。

那些在械斗中被烧毁的寺庙，当械斗停止、恢复和平之后，也被重新修建起来。上文提及的在械斗中被毁的几所宫庙，事后又全部修复。新店之漳州人还向泉州人买回被夺走的开漳圣王神像，重新修补损伤，以报心德㊲。那些在械斗中失败、被驱赶到其他地方居住的移民，当他们败逃时，并没有因为未能得到神祇佑护而将其撇下不管；迁居到新地方后，也没有对神祇冷落。例如，咸丰年间台北的顶下郊拼，当顶郊人攻入八甲庄时，下郊人“携老带幼，向北逃窜。有心人看见街内之城隍庙发火，连忙背起城隍神像随队落荒而走”。下郊人在大稻埕定居后，重新兴建庙宇，供奉由八甲街背来之城隍爷，此即现在的霞海城隍庙㊳。同时又兴建慈圣宫，供奉妈祖。再如，道光六年彰化县埔心乡闽粤人械斗，粤人败北，奉三山国王神像逃至今台中县东势镇中窠里，定居后，重新建庙奉祀之㊴。

随着械斗的发展，寺庙越建越多。尤其是台北地区，因道光以来人口剧增，各籍移民的

利益冲突越来越厉害，分类械斗也日益频繁而激烈，各方争先在台北周围诸山建庙，代为城堡，以利战斗。六张犁岭上的石泉岩（位于今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兴建起来的[40]。道光六年闽粤人分类械斗时，粤籍人占据今桃园县中坜一带，筑城屯营，并兴建仁海宫，以抗闽人[41]。当咸丰年间台北地区顶下郊拼最激烈的时候，三邑首领黄龙安等领导同籍人在淡水又兴建一座龙山寺，崇奉三邑人之守护神观音菩萨[42]。这一时期，台北地区涌现了一批寺庙。这些寺庙大多是移民们为祈求神灵保佑，使自己在械斗中取胜而兴建的。也有为平息械斗而建庙的，例如，咸丰四年全台漳泉人分类械斗激烈，中港一带人心惶惶，总理叶延禄等为首倡议，在今苗栗县竹南镇中港里兴建三圣宫，主祀开台圣王郑成功、保生大帝和开漳圣王，"意在祀三圣，以镇压械斗"[43]。

械斗不仅促进寺庙的修建，还制造新的神灵。台湾民间有称作大众爷、义民爷、百姓公、万善公、有应公之类的神灵，这些实际上是民间的无主孤魂，或死于械斗战乱，或死于天灾地变，人们担心其幽魂作祟，便葬其骸骨，立祠祭祀。这些祠庙或自己独立一座，或附设在一般寺庙的一角。根据仇德哉《台湾庙神传》的统计，全台有义民爷祠庙 30 座、大众爷祠庙 39 座，有应公祠庙 18 座、百姓公祠庙 11 座、万善公祠庙 8 座。这些祠庙中，有相当部分是祭祀当年死于分类械斗的幽魂。兹据《台湾省通志》之记载，举其典型者数例于下：

台北县土城乡埤头大墓公祠：乾隆年间，漳泉械斗，漳人在一次战斗中被杀八百多人，尸体埋于埤头，称为千人冢，漳人春秋祭扫。咸丰三年，有人祈祷病愈，从此香火不绝。

云林县北斗镇义民公祠：道光六年，粤人与泉人械斗，粤人横死者 81 人。事后，民众建庙祀之。

台中县丰原镇翁子里十八灵魂公祠：道光年间漳泉械斗，漳人假装讲和，宴请泉州人，席间击杀泉人主要人物十八人，后来泉人子孙建庙祀之。

台中县大安乡海墘村大安港崇善祠：道光年间漳泉械斗，泉州人战死甚多，尸体纵横，任凭风吹雨打，当地泉州人为之建祠奉祀，称为泉州公。

台北县新庄镇丹凤里慈悲寺：咸丰三年，漳泉人大起械斗，战死者甚多，双方合葬为有应公。事后又怜悯幽魂无归，于是在有应公侧建慈悲寺，为死亡者吊菩提。

台北县林口乡湖南村永善寺：咸丰三年漳泉械斗时，此地为战场，死者 110 余人，集中埋在一起，称为大众爷。人们唯恐孤魂无依，仗佛慈悲以济度，于是建永善寺，旁祀大众爷[44]。

分类械斗还促进民间祭典的兴盛。农历七月，台俗称为"普渡"，又称鬼节。七月初三开地狱，即开鬼门，至三十日闭地狱，亦即关鬼门。整月内是无主鬼魂的放假日，民间诸事不宜，唯有盛大祭祀。"街衢巷里，多轮流延僧登坛施食，寺庙亦各设坛建醮，二三日不等，以祭无祀孤魂"。一般百姓则备供品银纸祭于自家门口，称拜门口。全月之中，几乎每天都有地方在祭祀[45]。普渡之风如此之盛，与分类械斗有密切的关系。因械斗频发，死者众多，人们担心鬼魂扰乱人间，遂以普渡祭祀抚慰之。例如，基隆每年中元普渡祭典都很隆重热闹，其原因即与当地历史上的分类械斗有关。在基隆的开发史上，漳州人来得早，人数多；泉州人到得迟，人数少。两地移民因垦辟问题屡生纠纷，"酿成前后三次械斗，死伤无数。基隆每年七月超渡亡魂的盛大，似有弥补的意义"[46]。又如乾隆年间，北港的泉州移民与民雄的漳州移民因细故"演出一场恶斗，双方死伤甚众，事后协议，以普渡方式举行祭典，藉

慰亡魂，祀神镇压，以免阴间再起争执”[47]。除了在普渡期间集中祭祀械斗的鬼魂之外，有些地方另有例祭。如台中县大安乡崇善祠祭祀泉州公的日期为两次，一次为普渡期间的七月二十七日，另一次为三月二日[48]。

结束语

台湾各籍移民的守护神信仰是因其特殊的人文、自然环境而形成的，守护神及其庙宇在分类械斗中的特殊作用也是在那特定的年代及特殊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随着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变，各籍移民的守护神信仰逐渐地互相渗透，互为融合；同时，分类械斗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内陆式的宗族械斗。在宗族械斗中，守护神及其庙宇的特殊作用便不复存在。

---

①守护神信仰的具体情况参见拙文《台湾民间的守护神信仰》，《厦门大学学报》1991 年第 2 期。
②李元春：《台湾志略》卷 1《风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本。
③蓝鼎元：《鹿洲全集》第 49 页，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④姚莹：《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 41 册第 157 页。
⑤周凯：《记台湾张丙之乱》，见丁曰健：《治台必告录》。
⑥卞宝第：《闽峤辅轩录》卷 2，中国方志丛书本。
⑦参见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第 262 页，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⑧⑪㊱㊹以上数例均见诸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省通志》卷 2《人民志·宗教篇》第 10 章第 1 节。
⑨⑩⑫⑲㉝㊳王诗琅、王国藩：《台北市志稿》卷 10《杂录丛录篇》第 2 章《纪事》。
⑬林衡道：《台南市寺庙调查》，《台湾文献》第 13 卷第 3 期第 176 页。
⑭黄典权辑：《台湾南部碑文集成》第 3 册第 275 页，台湾文献丛刊本。
⑮㉟关山情主编：《台湾古迹全集》第 2 册第 187 页、32 页，台湾户外生活杂志社 1980 年出版。
⑯《台湾古迹全集》第 1 册第 223 页和第 2 册第 182 页。
⑰同上书，第 1 册第 125 页和第 2 册第 206 页。
⑱㉖㉘㊻同上书，第 1 册第 110、137 页、107 页、70－71 页。
⑳㉑㉒《台湾南部碑文集成》第 6 册第 700、704、705 页。
㉓丁绍仪：《东瀛识略》卷 8《遗闻》，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本。
㉔㉕㉛㊷邱秀堂编：《台湾北部碑文集成》第 18 页、19 页、110 页、104 页，台北市文献委员会 1986 年出版。
㉗《台湾古迹全集》第 1 册第 129 页和第 2 册第 197 页。
㉙林衡道：《台湾的历史与民俗》第 38 页，台湾青文出版社 1978 年出版。
㉚㉞㊲㊴㊶㊸《台湾省通志》卷 2《人民志，宗教篇》第 10 章第 1 节。
㉜黄志贤：《台湾寺庙大观——朝圣的足迹》第 1 册第 136 页，台湾道观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㊵林衡道：《台北市的寺庙》，《台北文献》第 2 期第 53 页，台湾成文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㊺㊽《台湾省通志》卷 2《人民志·礼俗篇》第 3 章第 7 节。
㊼《台湾古迹全集》第 4 册第 129 页。

（作者颜章炮：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邮编 361005）